

世界权力新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郑永年, 翁翠芬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 新加坡 259770)

[摘要] 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地位和作用的上升, 中美两国形成了一个“G2”结构。在世界权力新格局下, 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符合国际利益和中美各自国家利益。和平共处要求两国互相对对方的核心利益作出调适。然而由于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和相互恐惧, 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调整其对华政策, 而中国实力已经上升到可以要求美国作出这种调整了。面对国际新格局, 中国应改变过去被动的对美政策, 确立自身接触美国的新政策和新原则。为此, 中国应积极寻找和建立与美国互动的新的国际制度平台。现阶段, 东盟机制不失为一个可借用的有效平台。

[关键词] 世界权力新格局; 中美关系; G2; 东盟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0)05-0094-06

奥巴马上台至今, 中美关系似乎又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倒退”-“稳定”循环。奥巴马政府执政不久就一改以往美国对华政策“先抑后扬”的传统模式, 在 2009 年实现了很多“突破”。首先是规模空前的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 6 月在华盛顿登场, 紧接着两国军方高层互访出现历史性进展。年末, 奥巴马的首次访华把中美关系提升为“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在此期间, 美国国内学界不断有新的概念如“中美国”(Chimerica)和“G2”(两国集团)等出现来形容中美关系。^{[1][2]}

就在人们对中美关系充满期望时, 2010 年年初几个月, 中美两国就陆续在包括贸易摩擦、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喇嘛、谷歌、人民币汇率、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领域发生了冲突。但就在一些人惊呼中美国要“离婚”, 中美要“开战”的时候, 两国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却又出现了“和好”的迹象。在面见达赖后不久, 美国总统奥巴马主动向中国“示好”, 重

复一遍从前多次重复的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政策”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声明。接着, 中国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 中美也将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些令人迷惑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包括中美两国本身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关系两极化的看法。一方面, 无论中美关系往怎样好的方向发展, 悲观论者总是相信中美最终必有一战。从历史上看, 一个新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 从而引发新旧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无论是现实主义也好, 冷战思维也好, 总有一部分人这样想, 其中也一直有人想把中美关系引导到这个方向。^{[3][4][5]} 另一方面则是乐观者。乐观论者每遇到一些改善的迹象就马上会想到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政策层面, 无论悲观还是乐观都不能导致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如果悲观论成了真理, 那么战

争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若是这样,除了准备战争,还要作种种其它的努力干什么呢?乐观论者则经常是自欺欺人,看不到国家间不同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和经常性,从而对中美关系所存在的冲突认识不足,准备不足。

纵观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认识到,主导中美关系变化的一直是美国,中国总是处于被动,只能作出“救火式”的反应。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而宏观战略的形成要求对中美关系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世界权力新格局下的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然而,随着中国和世界其它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权力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在这个权力新格局中,美国继续是最强大的“一极”,但已经不能自主宰国际事务,而中国本身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个国际权力新格局,中国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有助于确立处理中美关系的宏观战略,避免往悲观论或者乐观论方向滑行。

世界权力的新格局具有两大相关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体制内。虽然中美两国都是核武器国家,但是这个“相互确保摧毁”的结构显然并没有主导中美两国的日常关系。制约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两国都处于现存的国际体制内。在克林顿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个称之为“接触中国”的外交战略。当时中国的力量不象今天那样强大,正在处于西方所认知的“崛起”之中。“接触中国”政策在美国对华战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提出“接触”战略之前,美国也存在着“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等策略选择。尽管“接触”政策产生之后,包括“遏制”和“围堵”在内的政策选择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不管怎样的政策都是围绕着“接触”展开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政策表现出“遏制性接触”的特点。^[6]美国的接触中国政策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它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

的需要,也符合中国本身的政策选择。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尽管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在美国的“遏制性接触”政策下向美国(和西方)调适。中国和前苏联不同,没有选择另建体系,而是通过改革和开放跟现存世界体系接轨,通过进入体系之后再在这个体系之内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作用。^[7]美国接触中国政策和中国开放政策的结合使得中国很快融入现存的国际体制,成为其重要的一员。在这个体制内,中美两国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尽管这个关系并不完全是对等的,但它制约着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

世界权力新格局的另一个特征是“G2”结构。中国在努力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同时,也确立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个体系内的位置也越来越高。从经济上看,中国现在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GDP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大国。这就是“G2”的来源。从表面上看,“G2”似乎是中美关系,但其实并不然,因为在这个体系内,还有其它很多国家。“G2”的概念不仅仅指中美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中美关系。“G2”关系处理不好,受影响的不仅是中美两国,还包括其它很多国家。甚至可以说,如果“G2”关系处理不好,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有可能并非中美两国而是其它国家。尤其在经济上,中美两大经济体的抵御能力大,但其它一些小国家则不然。在整个国际社会,其它国家对“G2”的冲突看得很清楚,知道谁应当负有责任。这对中美两国都会构成相当的压力,从而对两国冲突起到制约作用。

世界体系新格局的这两个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判断,即两国关系,好,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在“好”的方面,即使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些美国人所形容的“中美国”,也不会有象从前英美和美日那样的联盟关系。“联盟”是针对“敌人”的,但现在大家都处于同一个体制内,没有往日那样明确的“敌人”,因此中美之间不可能出现“联盟”关系。

在“坏”的方面，因为两国之间是同一体制内相互依赖的关系，即使出现纠纷，也不至于会发生大规模冲突，更不用说是公开的战争了。此外，在政策层面上，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中美能够合作表明这种合作不仅符合国际利益，而且也符合中美两国本身的利益。

然而，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和增加并不意味着两国利益的重合。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主权国家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在对美关系上，尽管中国方面一直强调“求同存异”，希望把“同”的利益做大来解决“异”的利益，然而事实是不管“同”的利益做得如何大都不可能消除“异”的利益。中美两国既然有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那么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呢？当中国正在不断上升而接近美国的时候，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重要。尽管各国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但不同的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只有通过互相冲突才能得到实现和增进。如果考虑到国家冲突对国家利益的损害，那么就会寻求实现和增进国家利益的不同方法。同样，如果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定义就会有所不同，从而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也会不同。简单地说，和平共处要求两国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互相向对方的核心利益作调适。而中美关系现在的问题也正在于此：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

二、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

那么，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作出调整呢？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自从进入国际体系以来，长期处于领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更成为唯一的霸权。尽管现在有其他新兴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开始慢慢地接近美国，但是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霸权地位使其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向其他国家作政策调适的心态，更不用说政策了。发展出这样一种心态很困难，而要把这种心态转化为政策更为困难。

除了美国的实力，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也是其不

愿意向中国调整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际政治历史经验表明，相互误解（misperceptions）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8]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表现为西方的一个强烈信念：中国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这个信念从一百多年前中国和美国开始打交道时就存在了。对美国来说，改变中国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美国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美国（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美国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两国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两国关系也自然转坏。因此，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中国会进入美国的国家利益链。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反映了这一点。1989年之后，美国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1989年之后，尽管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中国主动向美国的利益作调整。在经济上，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即使在战略领域，中国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这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以往把台湾视为是完全的“内政”问题转向与美国合作处理台湾问题。在国际层面，中国在诸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反恐战争等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

中国向美国调整政策的意愿更坚定了美国改变中国的信念。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都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

而消失。这也促成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即，美国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美国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定的道德判断，那就是美国代表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美国的导向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国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美国很难意识到其有需要向中国调整政策。

在美国误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误解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这种看法更强化了美国的信念。

在国际层面，很多人相信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关于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却很少有人考虑。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美国(和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对中国“有利”的论述，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被消失。

对美国(和西方)接受中国的这种误解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变化，中国往往只能作出“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甚至连对自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以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表现在政策上，就是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上，对很多国际问题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缺乏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理性回应。

随着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内的地位上升，一个

实际的“G2”已经形成。可以说，如果中美两国继续“误解”下去，更多的冲突会浮现出来。在美国不能理性认识中国之前，还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种种“噩梦”。如果这样，美国不会产生任何意识来调整自己的中国政策，促使两国关系朝着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对中国来说，既然自己不能成为另一个美国，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让美国了解“自己是谁”。而帮助美国(和西方)来重新认识自己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任务。

三、中国要确立自身的“接触美国”政策

考虑到世界权力新格局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国可以至少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处理中美关系。尽管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但在外交事务中，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开来。

第一是政治层面。美国是民主政治，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客都不可避免要炒作中美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当政府的内部政策表现很差时，就必须找外在的替罪羊。在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国往往首当其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这是国际关系的事实，中国不得不接受。中国可以抗议，但政治是永恒的，不会因为今天的抗议而明天会有所好转。

第二是战略层面。在这个层面，尽管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并且相互依赖，但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利用各种因素，包括西藏、台湾等，来制约中国。这可以说也是永恒的，一个大国绝对不会放弃努力来制约另一个大国。但是这些因素是否会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重点，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其它方面。

第三是国际层面。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核武器扩散、环保和气候变化、国际经济平衡等国际问题领域应当负起自己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并非是向美国一个国家负责，而是要向整个国际社会负责。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均有共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是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行为，而非为了迎合美国。这明显表现在这次中国在伊朗核扩散问题上的态度。利用一切手段遏制核扩散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责任。如果中国在这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和美国讨价还价，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责任大国。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避免和阻止美国由政治层面的考量上升为战略层面的考量。一些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必须作出理性的反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迹象。例如，考虑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即使在对台军售、达赖、贸易纠纷的高峰期，中国仍然同意美国航母停靠香港。而在伊朗核武器问题上仍然和美国合作，更是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的标志。这表明，中国已经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国际利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大国应当尽到怎样的国际责任。

不过，中国也要意识到，正是存在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国有能力来确立主动接触美国的策略。如前文所述，到目前为止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总是让美国人来“围堵”、“遏制”、“接触”或者“消化”自己。现在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中国必须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而主动考虑如何“接触”和“消化”美国的问题。中国没有能力来“围堵”或者“遏制”美国，即使将来有了能力，这也不会是最好的选择，一旦出现对抗，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于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都不利。但中国已经有能力来主动“接触”和“消化”美国，这是一种建设性而非对抗性的方法。

主动和美国接触就是为了避免对抗。中美两国的冲突有客观利益的因素也有心理层面的因素。接触就是要建立两国的互信，在互信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各自的利益。如上所述，中美两国的互信基础很低，甚至没有；相反，双方之间的恐惧心理很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上升，如果没有良性的互动，两国间的互相恐惧心理只会增大，而不会减少。因此，要实现中美两国的和平合作除了共同的利益外，还要通过主动接触美国，让美国“消化”中国，从而确定一个稳定的心理结构。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接触美国？一方面是要有接触的心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寻找和建立互动

的制度平台。美国在和中国接触时，依靠的是美国（和西方）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平台。尽管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G2”，但“G2”本身还没有坚实的制度平台。而现存的中美两国经济和战略对话平台，主要关切的是双边关系，而非全球性问题。如果“G2”只关注中美两国的利益，那么就会不稳定；只有当“G2”关注全球性问题时，这个结构才能稳定。但是，如果“G2”擅自决定重要国际事务，那和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国际社会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两个主宰国际事务的大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想见到的。

因此，“G2”必须有其它更具包含性的活动平台。这些平台如何建立？笔者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遵循的开放性区域主义可以成为中国主动建立这些平台的思想基础。开放性区域主义强调的就是区域组织的包容性。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上。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是所有区域组织发展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带动了东北亚其他两个国家即日本和韩国与东盟的关系。“G2”扩大制度基础的过程是开放的。在其演变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组织结构。但是，从方便和有效来说，“G2”可以借用东盟这个平台，把开放性区域主义扩展到中美关系。

东盟已经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和在此基础上的“10+3”机制。现在，美国也表示要“回来”（回到东南亚）。这意味着会产生另一个“10+1”机制（东盟和美国）。从“10+3”扩展到“10+4”机制并不很困难。首先，对美国来说，或许其在开始阶段不愿意进入这个机制，但是随着东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美国逐渐会有足够的动力来进入。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生效，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双边的经济关系必将深化。这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如果不想被边缘化，美国就必须在制度化方面努力。

其次，无论是东盟还是东北亚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美国过去在这里，现在在这里，将来也不会离开这里。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战略层面，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是显然的。东盟国家力“邀”

美国回来有其很大的理性。在东北亚，日本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但如果不考虑美国因素，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就会很难实现。东亚区域主义是包容性的，这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如果东亚国家没有能力把美国排除出去，那么就要考量如何消化美国的问题。实际上，随着美国重心移向东亚，美国越来越像一个东亚国家。这样，就必须把美国整合进亚洲安全机制。越是把美国排除在外，东亚就越不安全。道理很简单，你越排挤他，他就越有恐惧心理，就越想进入，不管使用怎样的方法。

此外，“10+4”机制首先是个经济平台，而经济上的互动最为容易。较之其他方面的互动，经济上的互动往往不是零和游戏，可以为政治上的互动造成良性的影响。中美两国现在面临的很多贸易纠纷尽管表面上表现为中美双边关系，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东亚和美国的关系。这尤其表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方面。如果不把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贸易关系考虑进去，就很难解释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如果把美国整合进东亚区域经济机制，美国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就不会象现在那样容易政治化了。经济上的整合也会对最终的安全问题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中美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中美

两国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亚洲的问题。如果中美能够在“10+4”机制基础上，培植军事信任，建立安全合作机制，那么不仅可以保障亚洲和平，而且也可以成为全球安全的一个坚实基础。值得指出的是，“10+4”机制本身可以是开放的，在此基础上可以扩展包括更多的相关的国家，即“10+n”。

迄今为止，“G2”还只是个自然的演进。“G2”要想制度化，就必须有来自中美两国的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改变“被”接触的局面，而主动确立接触美国的政策。如果要避免历史上大国兴衰造就的大国之间的冲突，中国就必须用更积极的方式来接触美国。只有通过互相的接触，才能减少、控制甚至消除相互的恐惧心理。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只有到了美国也有意愿来向中国的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作调适的时候，两国的关系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美关系仍然会继续会是中国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但必须明确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关系，中国的国际利益不能只围绕着美国转。从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来评估中美关系，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本质，处理好中美关系。

[参考文献]

- [1] Niall Ferguson. ‘Chimerica’ is Headed for Divorce [J]. Newsweek (Volume 154), 2009 (9).
- [2]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J].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2008(4).
- [3] Richard Bernstein,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M]. New York: A.A. Knopf: Random House, 1997.
- [4]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J]. Policy Review, (Volume 62), 1992(3).
- [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M]. New York: Simon &

- Schuster, 1996.
- [6] 郑永年. 大国责任: 转型中的中国国际战略 [M]. 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4.
- [7] Elizabeth Economy, Michel Oksenberg.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 [8]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M].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9.

(责任编辑 如月, 龚思铭)